

建立批評的平臺

高大鵬

——一種我們所亟需的作品

近年來由於歐美的影響和國內的自覺，文學批評的風氣業已在我們這個一度被稱為「文化沙漠」的地方逐漸開始成長起來；雖然在短暫的期間內它還不能充分達成其監護創作與匡正趣味之全功，然而畢竟我們已經有了這一方面的自覺和努力，批評風氣的受到重視已經是一項不爭的事實。然而正如文學創作之有待批評一樣，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本身也是需要批評的，文學批評的功能旨在維護文學作品之嚴肅性，同樣，批評的批評也是為維護批評的嚴肅性而設的。文學創作雖說是向一切讀者和批評家開放，事實上它只對嚴肅的讀者和嚴

肅的批評開放，少了這一點嚴肅性，則文學勢將不成其爲文學，而批評也勢將不成其爲批評了；我們不希望一個作家爲消遣而寫作，同理我們也不希望一個批評家爲消遣而從事批評，有兩樣東西是我們有權向他們要求的，那就是：一、專業性。二、敬業心。而這兩樣東西對一個批評家而言則尤較作家要顯得重要。理由在於創作純是一項藝術，而批評則實是一門學術，一旦除掉了這點嚴肅性，則學術的精神亦勢將蕩然無存了。這一點嚴肅的精神本是任何一種學術生命之所繫，也是無庸贅述的一項公理，沒有人敢以消遣的態度或玩票的心情去討論自然科學、甚至社會科學，沒有人敢對相對論或資本論掉以輕心，然而一涉及文學藝術，則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一般讀者大眾固然口沒遮攔，甚至於許多學者專家也不時地放鬆口風，出大妄語。讀者大眾的輕率態度也許是無可厚非的，因爲單純的欣賞無需向任何人負責。然而專家學者也信口雌黃則滋事體大、罪無可赦了。因爲批評的本質在於研究，研究的目的在於教導，教導的對象則是讀者大眾，既有這麼一個廣大的對象，則其所負責任之重大與影響之深遠也就不是單純欣賞所能比擬的了；

文學批評既爲學術研究的一種，它就必須和其他學術一樣要負責任，這「責任」二字本身就是對嚴肅性的最佳說明。然而何以其他學術都不在這「嚴肅性」上發生問題，而唯獨文學批評會發生問題呢？可能的理由有三，一是心理的，一是歷史的，一是學術分類的。心理的因素乃是源自一種錯覺，由研究的對象之性質所引起的，因爲文學本質上是一種藝術，遂使得文學研究本身也染上了幾分藝術性，在研究者的心理上先入爲主地以爲文學是一種僅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因此只好運用比況的方法加以說明，於是乃造出多少「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詞」以致「時恣縱而不儼、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用西洋的話來說，則眞個是讓「靈魂在作品中冒險」了。這種自由心證的結果是隨心所欲而逾矩，以文學作品爲觸媒，以實施對原作品的「再創作」，也就是俗語所說的借題發揮，以滿足不能從事眞正創作的醉翁之意。「借批評以創作」，這或許可以解釋很多印象式批評之心理動機，尤其是我國的許多詩話就是此一心理背景下的代表產物。追究這種結果所產生的原因，即在心理上的錯認，以一念之差誤以爲「

文學不可以莊語」，遂致於「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結果積重難返，乃由心理上的錯認造成了方法上的偷懶，這便形成了它的歷史因素，即是導向的偏差 the Bias of Orientation，所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當它形成一種文化特色，並成為文人品味 taste 之一重要部份的時候，這種偏差的導向就會成爲一種深巨的制約力量，無往不在且是無遠弗屆地控御著一切了。因此如果我們以曹丕的「典論論文」爲第一篇正式的中國文學批評，而以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爲傳統詩話式文學批評的最後一篇，這中間相隔一千六百多年的時間似乎毫無意義，因爲在基本上，這兩篇東西都是本著藝術的精神寫作的。曹丕可以信口開河地談「氣」，王國維也可以別出心裁地談「境界」，而不論「氣」或「境界」都是一種「藝術品」，一種直覺的產物，既不足以詮釋創作，也不足以判斷價值，更不足以匡正趣味，由於它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只能稱作是一種前科學 Pre-Science、一種玄學。說得更清楚一點，則它只能有限地幫助欣賞而不能有效地從事批評。它是一種文化的特殊產物，因此它所受到的制約

使它不可能超越這一特殊的文化單位而去批評其他文化單位之作品。由於它是一種特殊時代精神的產物，因此也無法超越它的時代而對未來的時代作品從事批評。前者如以「境界」論李、杜則勉強適用，若持以論葉慈、艾略特，則真不知從何說起了。後者如以「氣」論建安七子則或許可行，若持以論里爾克、梵樂希，恐怕就要力不從心了。一種不具普效性的特殊產物很顯然的不會是一種「科學」，則其受限制於歷史與文化也就理所當然，不足爲奇了。然而它之所以被名爲前科學，乃在於它有一種科學的企圖，即是以簡馭繁，以理統攝現象的企圖。氣者本是道家的玄學名詞，境界也者本源自佛家的名相論理。這種向哲學玄學借兵，以充實批評方法的用意始未必惡，因爲「以簡馭繁」、「以理統事」的精神本是科學的基礎，然而由於哲學本身沒有嚴謹的科學伴之發展以收相剋相生之效，哲學本身停頓在玄學的範圍內，影響所及，其賴蛤子文學批評也無法突破玄學而向前跨出一步，結果良好的動機造成了不良的影響，原來「以簡馭繁，以理統事」的企圖却造成了在方法上偷懶的惡習。而方法上的偷懶爲害尙不爲大，更嚴重的是這種方法

上的惰性及直接影響了心理上的惰性，造成了以批評混同藝術的想法和做法，甚至在還沒有證明批評之不能成為科學以前就先主觀地否定了批評也許可以成為科學的可能性，或者根本否定了批評工作在本質上可能具有的科學性。一種錯覺自古來便廣泛地存在著，即是：我們的時代是最進步的時代，我們的成就是最後的成就，而這種錯覺在人文科學方面，尤其是藝術文學方面最為顯著。在自然科學方面二十世紀的人已經相信科技發展之無限性，然而在文學方面却悲觀地以為這是最後的世代，固執地相信文學不會有所謂「進步」，甚至迷信文學不會有「發展」。一方面不敢藐視科學的潛力，一方面却又以為了解了文學的本質，其實人之所以為人而不為上帝，就在他對本質之不能了解，文學是從生命深處流出來的，了解了文學的本質實際上就等於說了解了生命的本質，我們當中，古往今來，有誰敢站出來說：他徹底地了解了這種本質呢？而如果我们對所謂「本質」這一個詞所代表的深義沒有誤解的話，則本質可以統攝一切法，也就是說，當一個人悟出文學之本質的時候他對所謂科學的本質也了解了，所謂「一通百通」，無所隔礙了，事實

上有誰對文學的「本質」了解過呢？一切文學理論不過是透過歷史的發展對文學作品所呈現出的諸種現象作一歸納罷了，誰能在無限的意義上對文學的本質加以了解呢？正如我們對科學的潛能不能預測，誰又能說他已確實地了解了這具有無限之可能性之科學的本質呢？由深度心理學的知識我們學到：世上只有「蓋棺論定」這個名詞而沒有「蓋棺論定」這個事實，所論定的只是能見的、有限的現象，至於不可見的，無限的潛能則甚至於連死者本人都不知道。而「文化」這一全世界、全人類的事又有誰能驟下斷語呢？西方科學的發展不過是產業革命以後短短幾百年的事情，而其變化之大已非瓦特當年所能知的了，同樣在科技可能予人性以根本變化的未來，又誰能預料文學的前途呢？而在此一巨大變化（姑且稱之為文學上的產業革命）來臨之前，誰又能斷言幾千年的文學成就不過仍舊停留在一種草昧時代的程度呢？面對無窮的宇宙而言，誰不是朝菌、誰不是惠姑？然而朝菌惠姑若知其自身之有限還好，若不知量力地侈言其不可能確知之事，則恐怕連其衝破自身之限制之可能性都斷送了。同理，當我們對人性，對科學和文學之本質都尚不

確知的時候却固執地斷絕了兩者之間的聯繫，以為「科文老死不往來」，則其結果恐怕於科學所損者少而於文學則所損者甚大；再就研究態度而言，則於二者本質無深了解而侈言二者絕無相關，則真是所謂非愚即誣了。文學批評現已列為美學的一部份，而美學則屬於哲學的範疇中，而哲學本身在二十世紀已和科學發生了密不可分的關係，科玄之戰雖然是本世紀的一大懸案，然而由此亦可看出科學對哲學影響之一斑。作為哲學一環之美學以及作為美學一環之文學批評漸漸趨向科學化，也是一個大勢所趨的結果。哲學沒有科學很容易流於玄學，而文學批評借用這種半玄學的哲學方法結果往往把自己陷進了死胡同，玄學性的批評是永遠不會有進步的，這也就是何以時隔一千六百年，而文學批評沒有根本上重大進展的原因，那些「前科學」的努力企圖本是極善意的，然而由於哲學本身的不健全而陷入了窘境，反而使科學化的意念變成了惰性的藉口，而文學批評也因了這種惰性的累積而變成一門藝術，由於這種惰性而造成了慣性，於是積非成是，文學批評本身無法成為獨立的學術！它既被視為是文學藝術的「再創作」而又不能取代真正的文

學藝術，於是便成了一種「假藝術」Pseudo-Art，又由於它缺乏真正的科學方法，乃使自己成了一种「假科學」Pseudo-Science，其結果是既不藝術又不科學。一種不能獨立的東西當然無法有長足的發展，而這種不能獨立的東西自然不能歸類，不能歸類便不能成為一門學術，既不被承認為一學術，則從事者自然不會全力以赴！於是上焉者取之以修養性情，而下焉者藉之以賣弄聰明，前者產生了詩教，而後者產生了詩話。兩者雖高低有別，而其缺乏學術之嚴肅性則一。嚴肅性之缺乏同樣造成了弊端，上焉者利用了文學批評，而使文學成為功利主義下的工具。下焉者糟蹋了文學批評，使文學成了風雅主義下的玩具。文學批評的不進步使文學本身的發展也受到了阻遏，白話文運動至今有人反對，新詩至今沒有受到全面的承認，而反對者與否認者又不能在舊語言舊形式中創造文學的新生命，於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遂使得文學在「全盤西化」的激烈作法下採取了反動的姿態，在「橫的移植」的畸形抉擇下走向了決絕的途徑。新與舊，現代與傳統之間出現了敵意的鴻溝，傳統的命脈不能借現代的創作以維新，而現代的作品也不能從傳

統的精神中得到滋養；試翻閱近年來所出版的幾部文學選集，芸芸的作品中有幾個是能「融合古今、中西合璧」的？大多數還是變成了「假古董」或「假洋貨」，而其所以如此，不能不說和「假藝術」和「假科學」的文學批評有關，當文學批評不能高瞻遠矚，達成其「監護創作、創造價值、匡正趣味」的「繼往開來」的歷史任務時，文學失去了「老成謀國」的賢相，而自然走上了「亢龍有悔」的險路，結果是傳統與現代兩受其害，文學與批評同歸於盡。今日國內文學的畸形發展原因雖然複雜，而當年文學批評之荒蕪和無能實在要負最大的責任，要挽回這種畸形發展也必先從健全批評開始著手，而健全批評就必須從批評本身的自覺和對批評的批評做起，批評是對創作的反省，而批評的批評則是對批評的反省，當文學創作需要有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來維護其嚴肅性的時候，文學理論和批評也需要批評的批評來維護其本身的嚴肅性；文學批評者所以產生負責的文學作品，批評的批評者，所以產生負責的文學批評，在批評風氣方興未艾的今天，提倡「批評的批評」是有其時代性意義的，專業需自敬業做起，而敬業需自慎始發端。

批評的批評在國內雖也陸續有人做過，但迄今尚未蔚為風氣，同其自身也還停留在原始狀態。常見的幾種形式有：一、批評雙方的論戰。論戰是這幾十年來最常見的一種形式，在前有新舊文學的論戰，後有批評派別之間的論戰，前者的對象是文學作品，後者的對象是文學批評，而所謂批評的批評應是以後者為主的，然而廣義的說，文學理論之商榷也應包括在批評的批評範圍之內。論戰固然是一種常見的形式，但也是一種消極的形式，而國內的論戰每以論事講理開始，以人身攻擊，潑婦罵街終，從義理之爭演成義氣之爭，結果損及了批評的嚴肅性，「正誼」的火氣燒燬了「正誼」本身，反而使有討論價值的問題得不到深刻的討論，更得不到合理的解決。因此論戰的形式畢竟不是個中最好的形式。二、褒貶式的批評：這種批評多來自黨同伐異的作風。或者彼此標榜，或者彼此詆毀，兩者間又以前者為最常見。其通常的方式是大褒小貶，小疵不掩大醇，它的目的使人懷疑，其嚴肅性也就打了折扣，結果也無法達成批評的任務。三、介紹性的批評：此種批評多藉書評的方式出現，短一篇，提綱挈領式地介紹個輪廓，其重點在於介紹

而不在於批評，這種文學多出於專欄作家之手，篇幅與性質所限，也不可能會有精密的解析與深刻的批評，其嚴肅性有先天性的限制，自也無法達成批評的任務。以上三種批評，都不是理想的批評形式，但我們可以從茲學到批評的批評所應避免、揚棄的是哪些東西。從而建立起正確的方向和原則。

一、要求理論的建立與文學批評以一種專業的精神，打破文學誰都能談的偏見，建立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使之成為一門有尊嚴的學術，消除把批評當做個人消遣的玩具或把批評當做社會改革運動的工具的態度，驅逐利用批評進行社交的政客勾當，正本清源，就批評論批評，不動火氣、不拉關係、不自欺、不旁驚，多談問題、少談主義，多用理性、少用靈感，多憑實證、少談心性。

二、要求理論與批評具有科學的精神，消除研究對象所可能給予研究工作本身的不良影響，從根本上減除藉批評從事再創作的企圖，嚴格劃分藝術和學術的畛域，並要求批評家自身的專業修養和訓練，多談已徹底了解的，少談並不十分自信的，對於現代新興的學問有接受的雅量，並接受這些新學問所給予文學

的方法和建議，譬如語意學，本是科玄之戰的導火線，語意學固然不可取代一切，然而其自有建設性的價值，倘若在五卅運動前後有人利用語言學的原理來說明白話文的可塑性與文學性，以及文白之間可能的結合方式與利益，則許多「義理」上的論戰自可平息，而使新舊文學及早得一適當之調和，使傳統與現代兩得其平且互相補足。甚至可以藉之節省在語言技巧上的時間浪費，以從事於內容的思考與充實，題材的深廣與崇高，則我國的文學成就或不止於目前的情況？總之，我們不能輕率地拋棄任何可能於文學批評有益的新知識和新方法，而這種胸襟是我們有權要求於一個專業批評家的。

三、對於不自信有這種專業批評資格和能力的讀者，我們希望他能多翻譯這方面够格的作品。批評的批評在國內雖不發達，在國外許多國家却是很有歷史性的，多翻譯這些作品可以刺激國內的創作，提高讀者的水準，自然對文學批評家有一種約束的力量，使他知道天下人不盡可欺。不久前楊牧先生嘗怪何以我國學人在外發表的英文作品常為佳構而在國內發表的中文作品則多為糟粕，想來這與風氣水準有關係，在

國外高手雲集，虎視眈眈，爲聲望計自不敢掉以輕心，及至返國則以通人自居，視國內如無人，沒有後顧之憂，自然口不擇言、肆無忌憚了。學術水準本需學術風氣來維繫，而翻譯佳作則是開風氣之先的重要工作；一國的文學固然常受翻譯作品之刺激影響（如國內許多詩人便是賴此起家的），而理論與批評（尤其是方法）則更不可缺少了翻譯的介紹與比較，有介紹才有認識，有比較才有進步，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固步自封只有自取毀滅。

四、批評的批評其對象與範圍可以廣及一切批評作品，諸如批評性的專書，或雜文，或學報裏的專著，甚或碩士博士乃至各級教師升等的論文，都是「批評之批評」的對象，再擴而至於正式的學術講演或課堂上的講義或學術性座談會，定期或不定期的讀書會，只要有文字記錄的都可以列爲批評的對象，而此

一風氣的推廣尤當以學院與文壇爲兩大重點所在，風氣所趨，可以使學院裏沒有誤人子弟的嘴，使文壇沒有貽誤蒼生的筆，厥功不亦偉哉！

批評的批評就消極方面言，在於整飭批評界的風氣，就積極方面言，在於使批評事業受到應有的重視，從而使它能夠充份發揮批評的功能以幫助文學的發展。它不但介紹國外的批評也介紹國內的批評，它不但研究古人的批評更研究今人的批評；「誅奸佞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不迷信古代，不輕信權威，以獨立思考和公開討論的方式，將古今中外的一切作品放置在同一個天平上稱量，在同一個手術台上解剖，在同一個實驗室裏分析，將該捨棄的捨棄，該存疑的存疑，然後才能如阿諾德所宣稱的：「將人類所思所寫的最好的部份介紹給世界。」

徵求啓事

歐陽子女士來信，希望以一百元代價徵求「現代文學」第二十期一冊，如有讀者願意割愛，請與本刊編輯部連絡（電話：五八一六二八三）。

書評書目編輯部